



瞿林东文集
第7卷

唐代史学论稿

(增订本)

瞿林东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瞿林东文集

第7卷

唐代史学论稿

(增订本)

瞿林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代史学论稿 / 瞿林东著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9

(瞿林东文集; 第七卷)

ISBN 978-7-303-21538-6

I. ①唐… II. ①瞿… III. ①史学-中国-唐代-文集

IV. ①K092. 4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0540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5072 58807651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<http://xueda.bnup.com>

QULINDONG WENJI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

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张: 35.5

字数: 52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8.00 元

策划编辑: 宋旭景

责任编辑: 齐琳 甄英军

美术编辑: 王齐云

装帧设计: 王齐云

责任校对: 陈民

责任印制: 马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5079

目 录

再版自序 / 1

自 序 / 5

上 编

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 / 13

- 一、三篇修史诏书：对史学的新认识 / 13
- 二、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收获和历史认识上的成就 / 17
- 三、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 / 24

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 / 29

- 一、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 / 30
- 二、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 / 35
- 三、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/ 41

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 / 46

- 一、晚唐史学的特点 / 47
- 二、两桩实录案说明了什么 / 50
- 三、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 / 55
- 四、民族史撰述的增多 / 60
- 五、历史笔记的勃兴 / 64

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——重读《唐会要·史馆杂录》 / 69

- 一、问题的提出 / 69
- 二、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/ 70
- 三、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/ 73

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 / 82

- 一、“览前王之得失，为在身之龟镜” / 83
- 二、“极为治之体，尽君臣之义” / 85
- 三、“盛业鸿勋，咸使详备” / 87

史学家和政治——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 / 90

- 一、史学家的政治情怀 / 90
- 二、史学和经世致用 / 95
- 三、史学和政治决策 / 100

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/ 108

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——兼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 / 118

- 一、刘知幾提出的问题 / 118
- 二、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/ 121
- 三、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/ 125
- 四、典制体通史和文征体通史的撰述 / 130
- 五、几点认识 / 134

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 / 139

- 一、谱学在唐代的兴替 / 140
- 二、唐代谱学和唐代的士庶斗争 / 149

三、唐代谱学和唐代的社会风气 / 159

四、 结语 / 167

下 编

隋唐之际的《汉书》学 / 171

《帝王略论》——唐初史论的杰作 / 176

一、 一个重要的问题 / 177

二、 残卷之谜和佚文巧合 / 179

三、 在史学上的价值 / 184

说《帝王略论》的历史比较方法 / 197

一、 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 / 198

二、 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 / 200

三、 以不同时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 / 203

四、 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 / 208

五、 历史比较的意识和历史比较的标准 / 211

一代明君的君主论——唐太宗和《帝范》 / 215

一、 史学家的君主论 / 215

二、 唐太宗的君主论 / 218

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/ 227

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 / 244

一、 三十年间撰成八部正史 / 245

- 二、唐初所修八史的成就 / 248
- 三、史家群体的人才构成 / 250
- 四、“总知类会”的作用和“监修”的责任 / 254

说“良史”魏徵 / 261

- 一、精辟的史论 / 263
- 二、以史资政的辉煌经历 / 265
- 三、“忠诚奉国”的忧患意识 / 268

评《隋书》史论 / 270

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 / 287

- 一、揭示出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/ 289
- 二、居安思危的历史辩证思想 / 295
- 三、知人、用人、任人的历史智慧 / 298
- 四、余论 / 303

《南史》《北史》散论 / 308

漫谈“八书”“二史” / 322

- 一、“八书”“二史” / 322
- 二、纵横交叉 / 325
- 三、长短互见 / 326
- 四、历史特点 / 329
- 五、社会风貌 / 333
- 六、典章制度 / 336

读《史通》札记 / 338

- 一、《六家》《二体》未能包举百代史学 / 338
- 二、三志并非“为志者所宜先” / 342
- 三、名实、体例和史识 / 344

论吴兢——纪念吴兢逝世 1230 周年 / 350

再读《贞观政要》 / 369

- 一、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和一部久具魅力的史书 / 370
- 二、以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再现“贞观之治”的风貌 / 372
- 三、“贞观之治”和《贞观政要》的辩证关系及其启示 / 376

韦述史学的成就与风格 / 380

论《通典》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/ 386

论《通典》的方法和旨趣 / 405

重读《通典》史论 / 431

- 一、史论的形式：序和论 / 431
- 二、史论的形式（续前）：说、议、评 / 434
- 三、方法论：不可“将后事以酌前旨” / 437
- 四、关于史学批评 / 439
- 五、人物评价及其他 / 443

说《通历》 / 446

- 一、《通历》的作者 / 447

- 二、《通历》的流传 / 449
- 三、《通历》的史文 / 452
- 四、《通历》的编纂 / 456
- 五、《通历》的价值 / 458

韩愈与《顺宗实录》 / 463

关于《顺宗实录》的几个问题——兼答张国光同志 / 474

- 一、关于韦本的流传问题 / 475
- 二、关于略本的来源问题 / 480
- 三、关于今本的撰者问题 / 482

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 / 488

- 一、一个被忽略的问题：柳宗元和历史学 / 488
- 二、《天说》《天对》：对天人相分理论的发展 / 490
- 三、《贞符》《封建论》：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/ 499
- 四、《非国语》：史学批判的理论价值 / 506
- 五、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：史家的信念与职责 / 521
- 六、简短的结语：高峰和局限 / 526

苏冕与《会要》——为会要体史书创立 1200 周年而作 / 530

- 一、苏冕撰《会要》 / 532
- 二、《会要》的续作 / 535
- 三、苏冕的史识 / 541

唐代史学考辨拾零（读史札记） / 550

- 一、唐俭和庾俭 / 550

- 二、《旧唐志》误记《梁书》卷帙 / 551
- 三、晁公武关于《周书》的误载 / 551
- 四、《氏族志》卷帙 / 551
- 五、礼部尚书与吏部尚书 / 552
- 六、唐太宗褚遂良问对年代 / 552
- 七、唐修《晋书》撰人 / 553
- 八、唐初国史 / 553
- 九、总章三年十月 / 554
- 十、刘知幾领国史 / 555

后记 / 556

出版说明 / 558

再版自序

1989年，我出版了《唐代史学论稿》一书，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，就没有再专注于唐代史学了，回想起来，总感到有些愧疚！当然，这些年来，因偶然回眸，心有所得，也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，趁着这次本书再版的机会，我把它们补充进来，也算是表明自己并未完全忘却这一研究领域的心迹吧。

当我撰写了几本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后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代史学，我以为它在一些方面还是能够反映有唐一代的盛大气象。

首先，唐初的官修史书，仅“正史”方面，就有《晋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周书》《北齐书》《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八部史书面世，占了“二十四史”的1/3。其中，《隋书》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，都是颇具特色的“正史”。

其次，刘知幾所撰《史通》，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和有体系的阶段，反映了

史学家自我批判的大度和勇气。《史通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，成为后世史家进行史学反思和史学前瞻的重要内容，是启发人们思考、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再次，杜佑所著《通典》，开中国古代制度通史的先河，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，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清晰认识，撰述中的史和论的结合，以及对历史著作“将施有政”的撰述目的，在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杜佑《通典》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，可追司马迁；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，乃是“九通”之渊源，是中国制度文明史撰述的承前启后者。

还有，集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史论家于一身的柳宗元，千百年来，其深邃的思想和隽永的华章被一代又一代学人传诵，而他的通达的史论确已具备了“疏通知远”的境界，却或多或少被人们忽略了。而今，当是凸显柳宗元史论价值的时候了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可以与杜佑比肩而立的。

唐初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方面，乃可与汉初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相媲美，这也符合雄汉、盛唐的气概。二者之间所不同的是，唐代的政治家、史学家们除了对历史有真诚的敬畏之心，还多了几分对史学的虔诚尊崇之意，这在唐太宗、魏徵、吴兢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说到魏徵，他的史论中的政治诉求和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，都十分突出，这同晚于他的杜佑颇有相似之处——杜佑是一个精于史学的政治家，又是一个通晓政治的史学家。他们二人的差别仅在于：魏徵始终任职于朝廷中枢，而杜佑在晚年入相之前长期身为封疆大吏。他们二人都是在政治上和史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，而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其他朝代却并不多见。

进而言之，如果我们以魏徵和杜佑相比较，还应当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个人的际遇：魏徵活动于唐朝欣欣向荣的时期，

而杜佑则处于唐朝走向衰落之途，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因此而有所不同。还有一点很大的差别，即魏徵面对的是唐太宗，故其见解得以发挥出来，并往往转化为朝廷的政策；杜佑则不然，他面对的是唐德宗、唐顺宗、唐宪宗，皇权为宦官所控制，杜佑的才华和智慧难以发挥出来，故处于位虽尊而难有大作为的境地。

这里又要回过头来说一说唐太宗。唐初所修八部“正史”，《晋书》和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“五代史记传”都是他下诏修撰的，与他有直接关系；《南史》《北史》同他也有间接关系，因为作者李延寿当时也在史馆任职。唐太宗关于史学的认识和政策，表明他不愧被称为是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”；他晚年撰写的《帝范》一文，也无愧是“一代明君的君主论”。关于史学，唐太宗有一句名言：“大矣哉，盖史籍之为用也！”千余年之下，今天的人们读到这句话，仍可感受到它的震撼力。

纵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，可以总结出来一个基本规律，即历史与史学的辩证互动关系，这就是：一定的时代条件必然影响这一时代的史学面貌，而一定时代的史学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，而且还影响到后世的社会，对唐代史学亦应作如是观。从这一观点出发，则唐初八史的修撰，刘知幾《史通》之史学批评专书的面世，杜佑《通典》之制度文明史的产生，以及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《非国语》和他的《天对》对千年以前屈原《天问》的“破解”等史学现象，都不难对其作出合理的说明和定位。关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，唐太宗说的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“览前王之得失，为在身之龟镜”，这不仅是对司马迁所说“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镜也”的历史回应，而且也是从史学方面对“贞观之治”之现实的诠释。

在《唐代史学论稿（增订本）》将要出版之际，上述这些，与其说是作者在这里重述过去的一些看法，毋宁说是在以现在的眼光反思过去的那些看法，因为这里毕竟包含了新近补充的一些文章的见解。

这些看法或许有不尽中肯之处，但在大体上是符合唐朝这个盛大时代的面貌的。

本书篇目编次，仍保持原书体例，即：凡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通论唐代史学之某一侧面者，辑为上编；凡关于史家、史书及相关个案之专论者，则略按研究对象的时间顺序编次，辑为下编。增订部分，其中有两篇置于上编、七篇置于下编；一篇为细碎考辨文字，编于书末。

《唐代史学论稿(增订本)》所收录的文章，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，而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。其间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历史发展了，社会进步了，学术提升了，人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种发展、进步和提升而有所变化。现在反观初版的《唐代史学论稿》，学步的稚态，蹒跚而行的足迹，是免不了的，作者虽感惭愧，但却无权改变《论稿》的面貌，因为它是作者历史的一部分。对此，作者希望同仁和读者予以谅解。至于书中其他缺点与不当之处，则衷心期待各方面的批评、指正。

瞿林东

2014年3月31日

自序

我研究唐代史学，断断续续，不觉已经十年。这十年的学术生涯，不论从哪方面看，固不可以曹雪芹说的“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相比附；但以自己的愚钝，确也是窗前、灯下、酷暑、严寒，不敢懈怠，并非是很轻松地度过来的。趁着本书的出版，我想讲讲我的认识及研究过程，也算是对自己这十年蹒跚而行的一个小结。

—

记得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，我去看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白寿彝先生。那时我还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工作，我去向先生请教今后该着重读些什么书。先生未假思索，嘱咐我还是读点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。尽管日月逾迈，人事代谢，我已经从事好几年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了，但我

过去却是跟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，这个事实不会改变。于是，此次会面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这条学术道路的契机。

大约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和思考，我决定从研究唐代史学入手。当时作这样的抉择，是基于以下一些考虑：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时期，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艺术等，都有名垂千古的大师和光彩夺目的成果。千余年来，对唐代文学（如诗歌、散文、传奇）、哲学（包括佛教哲学）、艺术（如书法、绘画、乐舞）的研究，代有其人，名家辈出，论著繁富。这种现象是令人兴奋的，它表明唐代文化确有其吸引人的魅力和奥秘。然而兴奋之余，我也不免有一点隐隐的惆怅：史学，作为唐代文化的一部分，虽也有众多的史家和辉煌的成就，但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寥落。而前人之论中国古代史学者，或称颂马班，或赞扬魏晋，或褒奖两宋，似乎唐代除刘知幾、杜佑以外即无足道者。从唐代文化研究来看，这显然是一个缺陷；从中国史学研究来看，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偏颇。

这样的认识究竟对不对，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，但当时确实是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作出抉择的。顺便说一句，在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，我已年届“不惑”，人到中年了，然而在自己的学术履历表上几乎还是一纸空白。因为痛感失去的时间太多，所以在思想上就颇有一种作“背水一战”的决心。这是当时的心情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“背水一战”的成果，原是微不足道的。

二

在研究方法上，我注意到两条：第一，先做编年。这是一种很笨的方法，但为了了解唐代史学发展大势，以避免在研究中顾此失彼，并力求在看法上的连贯性，还是硬着头皮先做编年。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，我粗粗地阅读和浏览了七八十种书，编了一本《唐代史

学编年》。通过做编年，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的脉络，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。第二，做双向考察。即一方面注意到从历史来考察史学，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、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；另一方面则注意到从史学去考察社会，以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。应当坦率地承认，对于后一种方法，我是逐步认识到的；当初，只是因为我讲授过几年中国古代史，比较习惯地把历史同史学结合起来考察罢了。现在看来，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。

从1978年年底我的第一篇研究唐代史学的习作发表时算起，至今恰是第十个年头。回顾这十年来的研究，有一个肤浅的感受，就是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反省，这包含着对于研究客体和自身认识的探索。起初，我比较注重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，选择的课题大多与此有关。后来我逐渐认识到，这种研究因立意较高，固有其优胜之处，但若非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，也极易流于空疏。于是乃转而有计划地研读一些史学著作，而于《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史通》《贞观政要》《通典》等留意较多。通过认真读书，再回过头来看史学与社会的关系，认识上又有所提高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进而认识到，应对唐代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历史思想和唐代史学发展之总趋势作整体性的把握，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一些规律性联系。近二三年来，我专注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撰述，但这仅仅是开始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”学问这件事，也只有“在‘知不足’‘知困’和‘自反’‘自强’中才能不断有所长进。”

三

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，唐朝时期不仅产生了优秀的史家和杰出的著作，而且在不少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反映出史学发